



大家文存
 粤派评论丛书

黄遵宪集

龙扬志 编

黄遵宪

SPM

广东人



大家文存
粤派评论丛书

黄遵宪集

龙扬志 编

本项目受广东省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遵宪集 / 龙扬志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1
(粤派评论丛书)

ISBN 978-7-218-12205-2

I. ①黄… II. ①龙…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近代—文集
IV. ①I2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67433号

HUANG ZUNXIAN JI

黄遵宪集

龙扬志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古海阳

装帧设计: 张绮华

排版: 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技编: 周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80千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粤派评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学术顾问：陈思和 温儒敏

总 主 编：蒋述卓

执行主编：陈剑晖 郭小东 贺仲明 林 岗 宋剑华

编 委：陈剑晖 陈平原 陈桥生 陈小奇 古远清

郭小东 贺仲明 洪子诚 黄树森 黄天骥

黄伟宗 黄修己 黄子平 蒋述卓 林 岗

刘斯奋 饶芃子 宋剑华 谢有顺 徐南铁

许钦松 杨 义 张 柠

总 序

近百年来中国文坛，“京派批评”“海派批评”以及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闽派批评”已是大家公认的文学现象，但“粤派评论”却极少被人提起。事实上，不论从地域精神、文化气质，还是文脉的历史传承，抑或批评的影响力来看，“粤派评论”都有着独特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有它的优势和辉煌。只不过，由于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的诸多原因，“粤派评论”一直被低估、忽视乃至遮蔽。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以百年粤派文学以及美术、音乐、戏剧、影视等评论为切入点，出版一套“粤派评论丛书”，挖掘被历史和某种文化偏见所遮蔽的“粤派评论”的价值，彰显粤派文学与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深厚底蕴，不仅能更好地展示广东文艺评论的力量，让“粤派评论”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而且有助于增强广东文化的自信，提升广东文化的影响力，促进区域文化的繁荣发展。

出版这套丛书，有厚实、充分的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依据。

第一，传统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明显不同于北方文化。如汉代以降以陈钦、陈元为代表的“经学”注释，便明显不同于北方“经学”的严密深邃与繁复，呈现出轻灵简易的特点，并因此被称为“简易之学”。六祖惠能则为佛学禅宗注进了日常化、世俗化的内涵。明代大儒陈白沙主张“学贵知疑”，强调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粤派特点的哲学学派。这种不同于北方的文化传统，势必对“粤派评论”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文论传统的依据。“粤派评论”的起源可追溯到晚清，黄遵宪的“诗界革命”，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潮，在

全国产生了普泛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药眠在《创造周报》发表大量文艺大众化、诗歌民族化的文章，风行一时。钟敬文措意于民间文学，被视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创始人。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粤派评论”的代表人物有黄秋耘、萧殷、梁宗岱等人。新时期以来，“粤派评论”也涌现出不少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艺评论家。如饶芃子、黄树森、黄修己、黄伟宗、洪子诚、刘斯奋、杨义、温儒敏、谢望新、李钟声、古远清、蒋述卓、陈平原、程文超、林岗、陈剑晖、郭小东、宋剑华、陈志红等，其阵容和影响力虽不及“京派批评”和“海派批评”，但其深厚力量堪比“闽派批评”，超越国内大多数地域的文艺评论阵营。如果视野和范围再开放拓展，加上饶宗颐、王起、黄天骢等老一辈学者的纯学术研究，则“粤派评论”更是蔚为壮观。

第三，地理环境的优势。从地理上看，广东占有沿海之利，在沟通世界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广东处于边缘，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近现代以来，粤派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种文明带来的思想启迪。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不安现状，积极进取，敢为人先，因此能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秉承中国学术的传统，又开创了“粤派评论”的先河。这种地缘、文化土壤的内在培植作用，在“粤派评论”的发展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

“粤派评论”有属于自己的鲜明特点。

第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是“粤派评论”最为鲜亮的一道风景线。在这方面，“粤派评论”几乎占了文学史写作的半壁江山，而且处于前沿位置，有的甚至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高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联合发表的著名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中陈平原、黄子平均为粤人。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方法先进、富于问题意识、善于整合中西传统资源和吸纳同时代前沿研究成果著称，它与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被学界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南北双璧”。杨义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比较方法运用在文学史写作的有效实践，该著材料扎实，眼光独到，分析文本有血有肉，堪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比肩。此外，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古远清的港台文学史写作，也都各具特色，体现出自己的史观、史识



和史德。

第二，“粤派评论”注重文艺、文化评论的日常化、本土经验和实践性。粤派评论家追求发现创新，但不拒绝深刻宽厚；追求实证内敛，而不喜凌空高蹈；追求灵动圆融，而厌恶哗众取宠。这就体现了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的结合，经济文化与文艺批评的合流，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文化挖掘的齐头并进，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的相得益彰，多元开放与独立文化人格的互为表里。粤派评论家有自己的批评立场、批评观念，亦有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和生长点。他们既面向时代和生活，感受文艺风潮的脉动，又高度重视审美中的文化积累和文化遗产；既追求批评的理论性、学理性和体系建构，又强调批评的实践性，注重感性与诗性的个性呈现。

我们认为，建构“粤派评论”，不能沿袭传统的流派范畴与标准，它不是一种具有特定文化立场、一致追求趋向和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它只是一个松散的、没有理论宣言与主张的群体。因此，没有必要纠结“粤派评论”究竟是一个学派，还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粤派评论”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实体，即虽具有地方身份标识，却不局限于一地之见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群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广东省委宣传部策划、组织、指导编纂出版“粤派评论丛书”，是贯彻落实十九大关于文化建设发展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一次文化实践。我们坚信，扎根广东、辐射全国的“粤派评论”必将成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其中一块最稳固的基石。

“粤派评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黄遵宪像

编者简介：

龙扬志，湖南涟源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兼任中国文艺评论（暨南大学）基地副主任、《世界华文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东荡子诗歌促进会秘书长、当代诗学论坛副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澳门文化局委托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重点项目，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90余篇，主编论文集多种。

黄遵宪与粤派评论视域之开辟

龙扬志

作为近代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黄遵宪（1848—1905）被公认为粤地出走的学术大家。而在粤派文学批评谱系中重新观察黄遵宪的开创地位和历史贡献，必须将其纳入中国走向世界的曲折过程，方可鞭辟入里，体会他在融合世界文学观念指导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来龙去脉和良苦用心，以及在推动时代文化语境转换、文学观念变革中产生的深远影响。

当代学者黄霖撰写《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时，以是否适应和推动文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为基本评判准则，将近代文学批评分为传统与革新两大板块，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丘逢甲等岭南维新派倡导文学革命，在文学观念领域开辟了新的时代气象。黄霖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近代文学观念新变最初由传统内部的发展趋势引发：“近代文学思想的变化并不始于中西文学观念的直接撞击，而是出于一批地主阶级的改革家，从自我调节现有的政体和文化机制出发，强调文学适应变革的时势。”^①经由前后持续30余年的内部瓦解，随着驻外使节、留学生及通过各种渠道走向世界的人越来越多，经欧风美雨熏染过的改革派带来文学新质。黄遵宪17岁“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人境庐诗草·感怀》）的感悟，庶几成为印证其生命行旅之信条，并在观看世界的过程逐渐塑造其审时度势、开明通变的思辨方式。黄霖指出，虽然黄遵宪未脱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甚至处处讳言“革命”二字，但是“黄遵宪的诗歌‘维新’的理论和实践与梁启超‘诗界

① 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革命’在大方向及主要内容方面都是大体一致的，故作为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要求诗歌革新的思潮而言，黄遵宪无疑是一个最初的发动者，而且是一个最有成绩的实践家”^①。此当为中肯之论。黄遵宪一生融合贯通于外交时务、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思想启蒙等层面，成为文学维新时代的关键人物，同时为粤派评论奠定感时度势的时代情怀与开阔的理论视野。

众所周知，得益于文化地理便利之条件，近代文学维新运动由粤派知识精英推进，亦是顺理成章之事。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论述粤地独特位置，背岭面海，界于中原，交通海外。“广东，自秦、汉以来，即号称一大都会，而其民族与他地绝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颇有独立之想，有进取之志；两面濒海，为五洲交通孔道，故稍习于外事。”^②濒海之便造就了广东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优势地位，陈序经指出：“自中西海道沟通以后，西方文化继续不断输入中国。中国文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都受重大影响，逐渐趋于新文化的途径。固有文化在这种情形之下，也逐渐呈了崩裂的状态。自从西方文化传入以后，因为地理及其他的原因，粤人遂为这种新文化的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③黄遵宪文学与学术行旅亦受此风气熏陶，年少稽古学道，中年阅历世事，视野开阔，21岁（1868）即有“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杂感》）之诗，别创诗界之志，呼之欲出。

黄遵宪的人生道路大致遵循走向世界的路径推进。同治十年（1871），黄遵宪考取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次年取拔贡生，1876年（29岁）中举，1877年随同中国首任驻日本公使何如璋以参赞身份赴日。1882年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885年回国撰写《日本国志》（40卷）。1889年以参赞身份随薛福成出使欧洲（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1891年任新加坡总领事。1894年11

① 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95—396页。

②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新民丛报》第8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十五日，第50页。

③ 陈序经：《广东与中国》，《东方杂志》1939年第36卷第2号，第42页。



月自新加坡总领事解任回国，次年9月加入强学会，1896年捐资赞助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时务报》。1897年赴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参与湖南维新改革。1898年6月充任使日本大臣，因疑藏匿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流亡人士被搜查，后得旨放归原籍梅州，筑室人境庐。期间多次婉拒复出，直至1905年2月因肺病逝世。黄氏旅居日本期间创作《日本杂事诗》两卷，录诗200首。1891年辑成《人境庐诗草》四卷，后经不断增删补订。“放归”之后扩充成11卷。二者为奠定黄遵宪诗人地位的代表作品集，因其诗作题材广泛，诸多篇什涉及琉球事件、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海外见闻、华人劳工、留学生以及山歌等范围的书写，被视为开启诗界新境的先声。尤其经时贤丘逢甲、梁启超、康有为、胡适等人举荐，黄遵宪逐渐在诗坛深入人心，成为引领新派诗写作的标志符号。如梁启超就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反复力荐：“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公度之诗，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公度之诗，诗史也”。^①胡适从文学发展源流论及“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②，通过新文学史前史梳理肯定先知先行的意义，到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写作浪潮兴起，黄遵宪的诗歌创作成就和文学地位已被普遍认定。^③

不过，有关黄遵宪在诗学革新方面的主张与“新派诗”写作的价值评价一样，历来存在不同观点。比如《日本杂事诗》对新事物和新概念的使用，一方面契合了晚清追新猎奇的风气，能满足当时读者对于异域风物和社会状况的阅读想象；另一方面可能对传统意象构成异化，在诗歌美学层面消解其文化感知，因而后人对杂事诗的艺术水准颇多疑问。钱锺书认为《日本杂事诗》“假吾国典实，述东瀛风土，事诚匪易，诗故难工”，“语工而格卑”，“每成俗艳”。^④正如台湾学者郑毓瑜所说，钱锺书的说法切中了当时旧诗人的困境：

①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4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十五日，第100页。

②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8页。

③ 具体可参看李玲博士论文《黄遵宪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奠定（1899—1949）》，苏州大学，2013年。

④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48页。

旧诗语不能巧妙地表达新事物，用上新事物也往往弄得不像旧诗；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19世纪后半叶这些出身于传统知识体系的士大夫，即便向往西学、重视洋务，旧诗写作还是他们表达自我与沟通人我的熟利方式。^①所以，在考察黄遵宪诗歌观念尤其批评理论时同样需要理解文化发展中的复杂性和迟缓性特征，因为理论话语的零星呈现、新旧杂糅的确难以通过简单易行的方式加以清理。比如有专家指出：“从个人选择、创作态度与当时文学运动、诗歌派别、文坛风气的关系来看，黄遵宪与所谓‘新派诗’和‘诗界革命’在新与旧、名与实之间也留下了值得认真清理、深入反思并清醒认识的文学史和学术史经验。就与‘新派诗’的关系而论，黄遵宪在早年诗作中写下的‘我手写我口’和在中年诗作中写下的‘读我连篇新派诗’，本来只是诗歌创作中即兴的有感而发或酬答友朋时随手写下的普通诗句而已，并未进行过深刻的理论思考或严谨的逻辑阐述，也没有其他论述的有力支撑或明显证明，因而其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成熟的理论意识、思想内涵或倡导诗歌变革的主观意图。”^②零散观点确实可以成为反思黄氏文化姿态与思想经验的切入点，也正好说明学界有重新认知黄遵宪的文学批评视野与话语体系之必要。

文学批评不能抽离主体生存的历史语境，黄遵宪的批评话语不仅反映了“过渡时代”有关文学观念表达的总体状况，也体现出如何面对时代发言的意义。作为处于新旧学术转换时期的参与者，黄遵宪对文学主张的理解与表达并未如后来者那样诉诸严谨的专门论述，更多融入在序跋、评阅、书信等相关文学实践之中。所以，科学辩证的态度是不妨采取同情的眼光，在已有的历史基础上理解其诗学主张和批评方式，代替强求专门理论著述之于黄遵宪的必要性，不妨结合黄遵宪的时代关怀与理想实践，超越对观念表述的刻板追求。

实际上，黄遵宪与近代大部分文学批评的异质性，首先体现于文学观念的专业知识背景。因近距离观看日本形成的知识视野，在日后成书的《日本

① 郑毓瑜：《旧诗语的地理尺度——以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中的典故运用为例》，载吴盛青、高嘉谦主编《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85页。

② 左鹏军：《黄遵宪的文化姿态与思想经验》，载《岭南文献与文学考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

国志》中演进为语言变革主张的实证基础。概言之,《日本国志》的历史贡献在于主动观察日本,首次向中国士大夫全面展示了日本由封建走向中兴的基本过程,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需要认真思考的镜像,并重构有关日本的认知。日本长期以来用心学习中国文化,小心翼翼地注视中国发生的一切变化,幕府末年开其西化转向,西学东渐在日本近代变革中扮演的角色作用至关重要。黄遵宪通过社会观察和交往实践,直观感受语言文化层面改革的积极后果,他在介绍日语言文一致过程之后,在《学术志二》的评议中指出语言与文字“不相合”对于开启民智的影响:“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①中国的言文分离造成“通文者少”,阅读书写与日常生活严重脱钩,普通民众难以接受专门化的高成本教育,导致社会整体文化水平落后。虽然白话文运动已于晚清开始使用,黄遵宪从域外审视汉语改革甚至拼音化可能。正如文贵良所说,黄遵宪诘问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这种学习和诘问折射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百余年中“母语心态”的纠结发展。^②黄遵宪的语言改革主张对后来的文学改革产生的参照意义不言而喻,不仅直接影响到梁启超的文学革命主张,实际上也为后来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发起白话文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其次,黄遵宪的批评价值立场决定其重点关注文脉变化,强调文学之于时代与民族国家的意义。综观黄氏著序跋评论文字,独立成文者凡24篇,其中不少是评述日本诗人、汉学家创作与整理的序跋类文章。此类评论记录了其与日本文人的交往,虽然总体上平和中正,对于促进中日文学交流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他认为诗学文章的规范可学而至,故功夫在诗外,但是兴象神韵需要长期用心揣摩,不可造而得之。在他看来,诗歌以表述自我为鹄的,终极指向是写出今之人的体验。这一点《人境庐诗草》体现得更加明显,他曾在自序中

① 黄遵宪:《学术志二·文字》,《日本国志》(卷三十三),载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20页。

② 参见文贵良:《黄遵宪:汉语认识的世界视域与现代开端》,《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

夫子自道：

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迄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①

通过个人感受支撑主体写作意义，并由此强调文学的时代特征，是为“新派诗”的理论依据。相较于《日本杂事诗》，世人更看重《人境庐诗草》体现的诗歌理想，正是其题材、形式皆有耳目一新之感。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谈及诗歌变革或许可借鉴民间文艺：“然实诗界中之异境，非小说家之支流也。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至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技辞。即‘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之辞也。”^②时贤推《人境庐诗草》之诗史意味，在于诗人感时忧世，直抒生命行旅之情思。而晚年诗作对民俗资源的借用，见出其从地方文化经验出发，突破古典束缚的意图。丘逢甲1900年冬造访人境庐，评黄氏诗草“四卷以前为旧世界诗，四卷以后乃为新世界诗”，肯定其惨淡经营，终得回报。后来钱仲联评价黄遵宪诗歌，虽然部分诗作不乏粗疏，但是“其天骨开张，大气包举者，真能于古人外独辟町畦。抚时感事之

①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1891），载《黄遵宪全集》（上），第68—69页。

② 黄遵宪：《致梁启超》（1902年9月23日），载《黄遵宪全集》（上），第432页。



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①。黄遵宪赋归之后关注本土教育，参照西式轨制兴师范学堂，以期向外输送更多的人才，实现其未竟的文化理想。此外，他还先后为客家才女叶璧华《古香阁诗集》、同乡张榕轩钞辑先辈诗稿《梅水诗传》写序，借此勉励客家兴女学，由语言文化传承引申至民族身份与生存，关怀可谓既深且广。

第三，黄遵宪的文学认知与批评观念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文学创作、诗学理想、文化行动与传递新知、开启民智紧密关联。王韬曾说诗文学问是为公度之余事（《日本杂事诗》序），大抵是准确的。钟叔河曾经指出黄遵宪的多重身份，其中诗人排在末位：“黄遵宪首先是一个维新运动家，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爱国的政治人物，然后才是一位诗人；他的诗，也主要是政治的诗。”^②1880年王韬为《日本杂事诗》在香港出版活字版，并在序言中说其诗体现出鲜明之实用性：“叙述风土，纪载方言，错综事迹，感慨古今；或一诗但纪一事，或数事合为一诗，皆足以资考证。大抵意主纪事，不在修词，其间寓劝惩，明美刺，存微指；而采摭浩博，搜辑详明，方诸古人，实未多让。”^③后来黄遵宪亦在伦敦写的自序中说明写作缘由：“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弗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④而由早年的经世致用，到晚年方发现自己“生平抱负，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⑤，由认知外部世界到返回内心世界，表达其人生与诗学的双重理想失落于时代，这固然是晚年心境低落的体现，但也折射出他对实践本身所寄托的期许。

与创作相比，文化实践性表现最为彰著者，当数黄遵宪对开创报刊的热心介入。旅居日本期间，他见证了新闻媒体的发达和启蒙作用，《日本杂事诗》（五三）写道：“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

①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61—162页。

②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0页。

③ 王韬：《日本杂事诗·王韬序》，载《黄遵宪全集》（上），第5页。

④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1890），载《黄遵宪全集》（上），第6页。

⑤ 黄遵宪：《致黄遵楷》（1904年6月），载《黄遵宪全集》（上），第451页。

六合之内同此文。”对新闻纸讲求时务、不出户庭而知天下事颇有感触。《强学报》于1896年被查禁终刊，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①。黄氏积极推动创办《时务报》，并捐金一千元为开办费，特意声明所集款不作为股份，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此外，他亲自介入报馆章程修订、聘请翻译等大小事宜。通过报刊开创推动启蒙，客观上起到了建构公共文学空间的作用，促进了文学传播与理论话语场域的生成。后来《时务报》改制，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归居家乡的黄遵宪阅报之后多次致信梁启超，肯定“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同时也就民权、自由、民主、启蒙、时局等问题与其展开交流，梁启超先后六次将黄氏来函在《新民丛报》“饮冰室师友论学笈”栏目公开发表，意在表明自己针对社会时弊、家国前途发表的意见得到前辈热情回应，同时为后世研究黄遵宪文学批评思想和晚年心境保存了相当完整的史料。

1905年2月23日，黄遵宪病故于“在勤堂”，曾被誉为“诗界三杰”之一的蒋观云寄来挽诗，其中有“才大世不用，此意谁能平。而公独萧散，心与泉石清。唯于歌啸间，志未忘苍生”之句，聊聊数语，概括出黄遵宪心怀家国、志在苍生的文化情怀。所幸的是，由他所开辟的文学新域，连同其定下的批评格调与人文气象，在后世粤派文学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时代脉络中逐渐发扬光大。

^①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